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多元共生态势下的“相思湖诗群”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6-11

[作者] 董迎春

[单位]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摘要] 近几年来,在广西诗歌多元发展的态势下,“相思湖诗群”依凭“相思湖作家群”的人文传统,其诗歌创作受到诗坛的关注。在诗歌创作上“尊重个性”的同时,诗学主张不断形成共识,具体表现如下:首先,诗歌,作为生活的“一种建制”;其次,以暴制暴,从思维上强化语言的生命旨归。第三,诗歌要考虑“隐匿者”的存在,学会召唤读者相应的情绪。第四,诗歌伦理学:诗歌与大地合一。

[关键词] 多元共生;思潮诗群;语言艺术;诗歌伦理学

一、多元共生态下的广西诗歌在首届中国诗歌节“中国诗歌论坛”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思敬指出,近些年来中国诗歌呈现了一种消解深度与重建诗歌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的写作并存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广西的诗歌创作尤是。随着广西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日渐生成与定型,诗歌写作的外部 and 内部环境日益宽松,以往单一的“民族性”及“地域性”写作逐渐为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趣味为特征的“多元化”格局所取代。综观当下广西诗歌现状与发展态势,广西诗歌、特别是以青年诗人为主的写作显示了广西诗歌的发展后劲,在以往以“漆诗歌”、“扬子鳄”、“自行车”为主的广西诗歌格局的基础上,广西当下的诗人与诗歌团体在写作中,相互取暖、互相学习,出现了共生、团结、活跃的共同提升广西诗歌水平的良好发展态势,呈现了多元发展态势。在20世纪80年代,广西就出现了一批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现代诗人有杨克、黄堃、琼柳、黄神彪、林白、贺小松、张丽萍等;到90年代以来,更多的新面孔如刘春、非亚、麦子、罗池、盘妙彬、谭延桐、黄土路、阿权、戈鱼、魏雨、安石榴等开始在广西诗坛涌现。此外处于自发性的民间诗歌流派也日益活跃起来,比如“自行车”、“扬子鳄”、“漆诗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如诗评家陈祖君在谈到“广西诗歌现状”时指出:“《扬子鳄》大气高贵,不同路向与风格兼容并收,达到了全国性大型先锋诗刊的一流水准,《自行车》前卫反叛,有一种独来独往的卓然风度,《漆》富于经验性,其‘诗人们无法为生活镀金,但可以给生活上漆’的宣言显示了新一代诗人不流世俗的诗学旨向。”[1]最近,从北部湾兴起的“低诗歌”也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代表先锋的南宁‘自行车’和代表关注本土的北流‘漆诗歌沙龙’两极写作风格张力下,桂林的‘扬子鳄’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抒情品质,还出现了两大诗歌后起之秀——河池学院的‘南楼丹霞’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相思湖诗群’。”[2]这两个从广西高校新崛起的具有“群”特征的“南楼丹霞”(河池学院,曾经出过知名作家东西、凡一平、黄土路等人)与“相思湖诗群”(广西民族大学,形成了“相思湖作家群”)为广西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诗人创作的队伍在不断增大,民间诗歌流派在增生,广西诗歌呈现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广西诗歌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共生。一方面应和了当下中国诗歌的两种写作现状:一部分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具有建构意识与文化特征的写作姿态(以刘春、谭延桐、大雁、斯如、董常跑等为代表);一部分以“民间立场”与反讽戏谑为价值取向的“口语写作”(以非亚、朱山坡、吉小吉等为代表);还有,从地域性与民族性角度,从现实经验出发,寻找与挖掘广西诗歌的本土资源,使广西诗歌在全国的语境中获得了认同,并且建构了广西诗人不可替代的立场与文化身份。近几年,国内各大文学刊物在相继发表刘春、非亚、盘妙彬、谭延桐等人的诗歌的同时,也不断推出具有写作实力的朱山坡、吉小吉、大雁、黄芳、董常跑等诗人的诗歌,这些迹象,体现了诗歌界对广西诗歌的写作认同与广西诗人新的生长可能,使广西青年诗歌群体迅速崛起,成为广西文坛乃至中国诗坛的新生力量。二、“相思湖诗群”的历史渊源与创作现状“相思湖作家群”是生发在只有几十年办学历史的广西民族大学并在广西和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秉承传统,“相思湖诗群”是“相思湖作家群”的一个分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形成,但是成为一个集中的、共时的创作集体并作为概念提出来还是这两年的事情。相思湖畔从来就不缺乏诗歌,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相思湖畔走出了一大批优秀诗人。以韦其麟、苗延秀、王一桃等为代表的老一辈诗人开创了相思湖诗歌的历史先河。此后,有杨克、黄堃、鲍夫、辛古、黄神彪等知名诗人紧跟开拓者的步伐,在广西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近几年来,相思湖畔涌现了许多诗歌爱好者,被命名为“相思湖诗群”。“相思湖诗群”是广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与学生组成的一个诗歌创作团体，是“相思湖作家群”的一个重要分支。2004年底，文学院一批爱好诗歌的师生聚集一堂，进行定期的诗歌研读和交流，并将这一活动称为“常跑文学沙龙”，这便是“相思湖诗群”的雏形。半年后，由文学院写作教研室牵头的诗歌内刊《相思湖诗群》第一辑出版，学校领导、教师及著名诗人洛夫、诗评家叶橹等诗坛骁将应邀出席了2005年末举行的“《相思湖诗群》研讨会”，于是由文学院教师董迎春提出的“相思湖诗群”这一概念正式确立。同年12月底，由“相思湖诗群”举办的“迎2006元旦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南宁各高校近300名文学爱好者参加并取得圆满成功，此活动被《中国新诗年鉴》收录为2005年度诗歌事件。2006年3月，广西民族大学首届“相思湖诗歌节”隆重举行，20多个南宁高校文学社团和各大媒体记者参与了持续半个多月的诗歌节。当年8月，“相思湖诗群”成员参加了“广西第二届青年诗会”，随后《红豆》、《广西文学》、《青年文学》等区内外文学刊物先后推出了《相思湖诗群作品专辑》，“相思湖诗群”得到了从广西到全国诗歌界的一次集体肯定。同期，“相思湖诗群”丛书陆续推出，目前已出版鲁西卷、董长跑卷、大雁卷、肖潇卷、侯珏卷、李冰卷、长河卷等诗集。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文学院的支持，也是文学院“大写作”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此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诗群”的创作队伍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其成员作品被大量刊登在省级和国家级文学刊物上，“相思湖诗群”在相思湖作家群的创作传统浸润下出现并快速崛起，使许多青年学子从诗歌创作开始，走上更为丰富的文学道路。而在当前以董长跑、大雁等代表的青年诗人以及在他们的引导和影响帮助下逐渐形成的以侯珏、长河、陆辉艳、李冰、黄玲娜、肖潇、朱叶、胡银锋、谭慧娟等学生诗人为核心的“相思湖诗群”，正在悄然崛起。正是带有学院风格的宽松的文化氛围，促成了“相思湖诗群”在文化多元的立场上表现出诗学取向上的统一性和相似性：他们坚持心灵写作，拒绝虚假的伪诗歌为文学。他们在坚守自己的诗歌信仰和阵地的同时都不约而同的以关心现实，直面人生，相信未来的姿态介入诗歌。诗人们知道在诸种文学样式中，诗歌是一向被认为是最贴近人类心灵，最具灵性品质的一种。甚至被荷尔德林称为“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著名诗人李瑛也说过，诗歌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心灵的事业，它会通过自己特殊的途径，作用于人们情感和精神，使人变得更纯洁、勇敢、崇高。相思湖诗群青年诗人正是坚持着以心灵和诗歌对话的纯真本性进行诗歌创作，这是他们作品真挚感人之处，每一个字词都发自内心。正如董长跑对故土家园以及父亲的无限热爱和牵挂，侯珏对村庄的深度审视和人文关怀，李冰对生命存在的真切思索和关注，黄玲娜、兰章对隐藏在城市以及现代文明背后的危机的深深追问，长河、肖潇、唐朝对爱情失意以及青春苦闷的宣泄，无不是诗人灵魂写作的真实体现。在研读“相思湖诗群”作品集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诗群成员之间形成了“农村”和“城市”相互“对抗”的两个派别。其中董长跑、侯珏、长河、肖潇、唐朝等人把更多的目光撒向了家乡故土这一精神视域。而李冰、兰章、黄玲娜等人的创作视角里几乎没有田园山野。诗群成员的作品不约而同走向对现实的关注，抒写自己所熟悉所亲历的生命感受，坚持诗歌来源于生活的诗学理念。他们大多坚持必须首先介入现实生活，切入现实的肌理，然后才有资格进入诗歌。无论从形式内容层面，还是思想精神向度来看，当下刚刚崛起的“相思湖诗群”诗歌写作都展现了丰富性与驳杂性。如果以诗人们对于诗歌语言所带有自我倾向性的选择与使用形式的写作方式着眼，诗人们可以将当下相思湖诗歌写作大致归纳为三种写作倾向：一是“书面语写作”，二是“口语写作”，三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相思湖诗群”诗人大多坚持“书面语写作”，但在持这种语言风格写作过程中又各有差别。董长跑、大雁、侯珏、李冰等人的写作可以看作是“学院化写作”。他们在创作中追求诗歌写作的复杂技艺，注重诗歌文本所包含的文化经验与思想含量，并且侧重于西方现代诗歌语言资源与精神资源的借鉴性运用，并力图通过诗人自身的个体努力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因此他们的诗歌文本通常留有或多或少的西方现代诗歌的痕迹。诗人们可以把陆辉艳、长河、肖潇等人的诗歌看作一种“生命写作”，他们在写作中往往以人性的尺度追求生命真实，深沉的体验。心灵的感动是“生命写作”的内在效果，把情感的“纯度”与深度看作诗歌写作的追求目标。他们坚持以比较纯粹的抒情姿态有力的维系汉语诗歌的“古典”传统。里尔克说：诗人是秘密的存在。在任何一个时代，诗的灵魂都是自由而卓尔不群的。诗人靠自由精神活着，没有了自由，诗人的生命即意味着结束。“相思湖诗群”成员陆辉艳在自己的诗学随笔《诗歌：指向暧昧生长的可能》中写道：“从某种关联上来说，‘暧昧’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一种。‘暧昧’这一因素为诗歌的存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延伸空间，但它必须是具有某种和谐性的，否则，它会把诗歌引入歧途。”兰章、韦斌等人的口语写作，坚持“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诗学观点。通常直接将自己的真实经历或生活片段作为诗歌的题材与表现对象，追求“现实还原”的真实效果，拒绝形而上的精神升华，拒绝抒情，并将追求的日常生活与生命体验中“真实性”效果作为自身的重要美学宗旨。黄玲娜、朱叶、胡银锋的部分诗作可以视为介于“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之间的“复合型写作”。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综合了“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所具有的艺术优势，显示出了更为开放的语言态度以及更加突出的综合创造能力，寻找到了一种更符合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形，并且有着更为广阔的艺术发展前提的创作模式。他们的创作显示了洒脱自如的创造能力。从事多年诗歌教学与研究的诗人鲁西所说的，“相思湖作家群”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因为它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而“相思湖诗群”在当下情形是如此。在当前情况下要想为相思湖诗学价值取向以及精神向度作一个合适的概括是困难的。一方

面是因为诗群的写作仍处于“幼年期”，既没有相当数量的诗歌作品，尚未形成自身的相对稳定的诗歌风格也缺乏一定的诗歌理论建树。

另一方面，诗群不同于其他的诗歌流派，相思湖诗群坚持的是自由式个性写作，既没有共同的诗学主张，也不在诗学特征上加以限制。但是，在中国诗歌走向问题上，一方面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深厚积淀，一方面是西方现代诗歌的辉煌，在继承与拿来、取与舍之间，中国诗人在艰难地跋涉与思考。关于“相思湖诗群”的未来走向问题现在还很难做较准确的界定，但诗人个人觉得是逐步向中国传统诗学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董常跑是最早进行反思的，在他的《后现代叙事》里所收录的早期诗歌包含了大量的诸如“口语写作”、“下半身写作”，而在近期出版的《沉重的肉身》则明显表现出了追求诗美和诗歌内质的统一。其他的核心成员也不约而同的表现了这一特征，在诗的技巧上注重隐喻、象征和诗歌意象意境的营造，在内质上追求思想性和启发性。诗歌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艾青《诗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他们三者之间的最好的联系。[3] p134真是科学追求的境界，善是伦理追求的境界，美则是艺术追求的境界。“相思湖诗群”，在诗歌创作中，正是坚持了这三个境界的统一。在追求“真”、“善”的同时，注重“美”的提升。从诗艺角度讲，讲究诗歌的“外在美”和内在“张力”，善于从生存的实际感知引发诗歌的升华。通过营造高远境界给人以诗意的同时，不断发出对生命及个体存在，对故土、爱情等的诗意探问。从中寻求生命底蕴及人生真谛。在整体上追求诗的完美，追求诗的内在涵义和品质。

### 三、汉诗写作，如何成为可能？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写道：“诗人的欢乐事实上乃是歌者的忧心，歌者的歌唱守护着作为隐匿者的极乐，并且使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有所隐匿的切近中变得近在咫尺。”[4] p27荷尔德林的写作是“欢乐”的，海德格尔的“阐释”性的再创作是“欢乐”的；荷尔德林写出了“返乡”中的“福音”与故土不复的忧思，海德格尔用“返乡”证明了“此在”与“彼在”的关系。他们一个用诗的形式为诗人找到回家的词语，一个用“思”的形式让诗人们尝试回到本源与终极的可能。所有的文字，皆由心的涌现。他们伟大的词语，创造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沉思命运的方式，这就是所有与诗歌相关的诗人艺术家共同面对的伟大工作与身份认同。在日益疲乏的时代中获得了诗意的可能，诗人知道这种“家园”仅属于生活中绝少的一部分沉潜的人，（翟业明说，“诗写给两部分人，一是自己，一是小部分人。”）仅限于诗人略带“忧心”的词语，仅限于用这样的“忧心”召唤有着相似人生体验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者是自己的读者，他一次又一次地体验时代焦虑中的疼痛，他是呈现的，也是“隐匿”的。另外就是本真意义上的读者，诗歌让他们也在历史性的尴尬与措手不及的时代面对中心灵“返乡”，他们也是“隐匿”的。多年的诗歌写作中，诗歌让诗人明白了这些道理。正是对于这些缘于诗歌本真的体验的认同。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遵守身份认同的诗人天生是一个艺术家。我们通过语言在诗/思、诗人/读者之间架起沟通与实践的桥梁；诗歌在积极探索的同时，必须保持“抒情性”、“直觉”、“想象与创造性”、考虑到“读者”对接受诗歌的意义。诗歌如何在“大地上”游走呢？“相思湖诗群”作为广西创作现状中的一个带有团体特征的创作队伍，已经自觉会融入了广西诗歌的生长与发展空间，成为国内“学院派”诗歌又一“大本营”。“学院的训练对于诗学的科学性是必需的基础与保证，学术上的成功者往往产生受过学院严格训练的这些人之中——目前的现代诗学中的科学先锋派，正是主要由出身于学院和仍生活在学院的评论家们组成。”[5]P7他们在诗学研究创作上，处于不断的探索与思考、思维方式的裂变中。但作为“学院派”诗歌团体，“相思湖诗群”的创作与文化身份的双重“在场”，成为汉语诗歌写作界的一个较有地域与文化特征与学院风格的诗学新生力量。“相思湖诗群”在平时交流与创作态势上，诗学原理也走向了较相近的取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诗歌，作为生活的“一种建制”（德里达）。任何人首先是作为生活中的个体出现的。诗歌首先指向了这样的生命个体。“大地上的艺术”，便是生存的智慧与姿态。诗人都是以“歌唱”的姿态出现的。诗歌的抒情性，正是歌唱性的体现。为断的歌建构了生活的诗意。再生活化、平民化、日常化的语言在诗人这儿都会包含着诗人对于历史、人生、世界呈现的思考。这种思考，从本真意义上讲，是自诗人情感投射的表象与确证。也是对于诗歌所有表现维度情感的深层的文化认同。诗人将这样的“沉思”用诗歌的语言表现出来，用内心歌唱出来。诗歌，成为人类表现内心的重要尺度之一。不断地歌唱，赋予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诗歌作为生活的建制，在于诗人身上所体现的探索性。有人将其作为“先锋”。而诗人更认为，这是任何一个诗人都应该明白的事实真相与“道理”。克罗齐说，人天性上都是诗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对于精神领域的自诗人捕捉，都是思，都是诗。诗人们在诗无标准中，唯一认同的标准，就是发现。谁发现了生活中，人生中，文化中，世界中，历史中的真相与道理的闪光之处，谁的诗歌就更具有发言权与话语的优势，在尽可能的范围中获得读者的认同与传播。这些“普适性”的生命感受，成为诗歌对话与相互确认的合法性的依据。诗人会继续在漫长的被责难中探索诗歌的道理。这样的自明，会让一个个体担当获得意义。也是人诗意栖居的可能。当然，他的失败，会如许多世俗的失败一样，也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其次，以暴制暴，从思维上强化语言的生命旨归。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传达的工具，更是一种认识媒介。“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者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它是人我们通过语言社会化、并借以理解我们自己和世界的意义视域；

而人和人的对话、沟通所依赖的就是这一意义视域的融合。”[6] P326-328 诗歌一定要忠于直觉。直觉即发现。直觉即是生命。直觉即真理的可能。直觉有助于产生创造性的语言与思想。任何诗歌话语（即语言）的背后，都隐藏着权力的关系。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沉闷，多少与当下人们对于诗歌的合法性权力的滥用与背叛。让诗歌成为道家权术家手中的利器，切割世人正常的神经，扰乱人们对诗意与审美的正常秩序。所以诗人的诗歌一开始在凭借可能的几个诗人的思想资源下，以自己的价值与精神趣味抵制当下叙事的泛滥与雷同。诗人的抒情是浮浅的，也是令人怀疑的。但诗人愿意以自诗人“在场”的文化的的方式介入当下诗歌写作的定性与走向的探索。诗人的思维，忠实于诗人的直觉。而不是当下流行的方式。诗人用这种近乎迂执的方式吁求抒情，吁求诗歌可以让诗人们回到诗意，诗歌应该来传达对于人类大道义的心灵拷问的终极可能上。诗人在对于语言血腥与粗暴的游戏中，也逐渐回归传统与精确传达人类情思的向度上。但诗人的语言永远在启示，在延异，在增补任何一种话语说的空白与声音。文学创作者不能一味屈从于现有语言的暴力，应自觉地向既定的语言符号秩序提出挑战。通过不断地创造与革新，通过对诗歌语言进行偏离与变形处理，通过疏离语言符号的常规秩序与用法，诗歌语言得以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模式，从而使主体在感受诗歌语言的能指中受到阻碍，并最终建立起一种生机勃勃的、异乎寻常的能指体验。我们强调“诗歌的想象”在于摆脱因袭的“文学惯例”与“文学传统”。它具体表现为，对语言、历史、文化、一种可能生活、人类命运终极可能的想象。没有想象，诗人们可能会让诗歌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趋于道德家与政治家说教的“传声筒”。第三，诗歌要考虑“隐匿者”的存在，学会召唤读者相应的情绪。诗歌的受众，属于那些热爱诗歌的人。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写道：“诗人的欢乐事实上乃是歌者的忧心，歌者的歌唱守护着作为隐匿者的极乐，并且使梦寐求的东西在有所隐匿的切近中变得近在咫尺。”[7]P27 文学（诗歌）语言并不像日常语言那样指事称物，传达有关客观事物的信息。相反，诗歌语言是自我指称、独立自足的；它运用变形、扭曲等手法，使自己从常规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出乎预期之外的表现手法，导致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新的意识。不夸大诗歌的可能。但是人类中任何一个空间不能没有诗歌。诗歌是心灵的返乡，是对于人类病态命运最痛苦的坚守与知性的启示。热爱诗歌，让诗人们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人。世界的本质，即是对于语言与历史的想象。想象即本质。热爱想象的人，必然热爱诗歌。诗歌的创造性与想象性，给了他们体悟人世沧桑的一种可能。而且，受众的命运，即是诗人的命运，即是人性的命运，即是家园的命运，即是人类的命运。任何人都无处可逃。第四，诗歌伦理学：诗歌与大地合一。“人，在大地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这多少代表了以焦虑、压抑等特征为代表的“现代性”下人们对诗意生存的一种渴望与向往。在这样态度下创作的诗歌将与一切“玩世”与“玩诗”的言语划开界限。诗人的诗中不乏口语的成份。但诗人惊恐任何一种无思的状态下的话语游戏与对所有诗歌彼岸的隐匿者的戏弄与遮蔽。诗人应该警惕可能滑入语言“逻辑中心主义”，从而遮蔽自己创作中的各种思想真相。所以，诗人一开始的探索就注定了这百年的汉诗写作，也仅是人类心灵史上一个雪白的浪花，一个善良的愿望。诗人愿意恪守这样的心灵愿望。这样的“思”，会让诗人愈加沉潜，愈加智慧，愈加热情，愈加“延异”（德里达）。这样的“诗”，道之诗，仁义之诗，善良之诗，人类之诗。尼采说，人类的伟大，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诗人的作品，便是诗歌的“布道”过程，它架起了诗人与善良的人之间的理想之“桥”。诗人一方面在“得道”的同时，鉴于他们在语言上的优势，诗人必须学会关怀所有熟悉与不熟悉的个体，将对人生与世界本质的体悟，用诗意的眼光去传达给他的读者。诗歌，让诗人回归了生命的平静，让读者回到了阅读时“远离现代焦虑”的平静。“每个人在大地上都是一生”（叶赛宁）。诗人在恪守诗人的职业时，对名利做最小化的追求。诗歌让诗人消解生命的焦虑。诗歌让读者远离焦虑。诗人一开始是在失落中找到诗歌成为诗人存在成为诗人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热爱与无奈认同的一种有效的途径。诗人的表现也必然赢得有可能的掌声。这样的声音，诗人知道早已经不属于诗人个人，而是生命，时代，人类，与伟大的沉潜的诗与思的人们。[参考文献][1]陈祖君，南方的声音——两广诗人论[J].南宁：南方文坛。2003，（6）[2]董迎春，多元共生态势下的广西青年诗群[J].南宁：南方文坛。2006，（6）[3]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沈天鸿，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6]Irena R. Makaryk,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U of Toronto P, 1993. [7]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作者简介]董迎春（1977-），男，江苏扬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艺学与文化批评2007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等。广西南宁，邮编：530006。电子邮箱：dongchangpao@163.com。

